

重要因素。

作为讲道理说服人这个过程中的主动者,不能仅仅是自己被说服。他还必须把握说理的方式,弄清道理怎样论述,材料是怎样说明观点的,做到胸中有全篇。评论语言是从论据证明论点的推进过程,每一层次都是上下承接前进的。它环环相扣,是一条彼此不可拆裂的链条。说理人清楚说理的脉络,心中论理的链条完整,全篇评论才会播得思路连贯、“理气”顺通,道理才有说服人的力量。

“我有理”的心态还应该包括要把观众听众说服的欲望。这种欲望使“我有理”的心态处于一种积极运动之中,期望着所讲的道理能够产生作用。使评论的话有明确的目的性,一句一段乃至全篇都指向了听众观众,使听观众能入耳,动心,使“我有理”都落到实处。

以“我有理”的心态播评论,并不是非要铿锵高亢的声音,更不是要象“隔山吆

牛”似的大喊大叫。“理直”也并非都要“气壮”,要看具体说什么理。有的时候,有理的人常常会慷慨陈词,但是,更多的时候,有理的人没有必要高声激情。常言也说“有理不在声高”。大是大非,必定要义正辞严,说话要有较重的份量,甚至要激昂奔放。而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道理,就必须要有耐心地去说服,平心静气地引导人们提高认识。既然是“我有理”,就该不慌不忙,侃侃道来,充满自信而不张狂,要说服人不一定非要耳提面命,剑拔弩张地压人不可。即使是重头份量的评论,倘或带着稳操胜券的信念,说理之间举重若轻,慷慨激昂中含着驾驭自如的从容,也会显得更加稳重而有力量。至于那种提请人们思考问题分析困难的议论,深沉也许比疾呼更能发人深省,冷静也许比急切更令人清醒。

“我有理”的心态是播好评论的前提,自觉把握好这种心态,播好评论就有希望。

中国电视史略(1958——1978)

郭镇之

从1958年中国电视诞生到1978年中央电视台系统建立,中国电视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缓慢前进的初创时期,由于政治动荡而遭受挫折的时期和拨乱反正的恢复时期。中国的电视尚不成熟;但它已初具规模,并为日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创业时期(1958—1966)

1.1958年5月1日,中国第一座电视台、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开始试验播出。节目是直播的,黑白色。市内有电视机30余架。

1958年10月1日,上海电视台问世。12月20日,哈尔滨电视台(今黑龙江电视台的前身)也赶在新年前与观众见面了。这就是

中国最早一批电视台，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电视事业的兴起。

中国电视诞生于大跃进年代，不久后，它就被赞扬为“大跃进的产物”。这当然是把一切成就归功于政治性或群众性运动的习惯做法。其实，中国电视起源于几年之前。早在1955年初，建立电视台的提议就被列入了文教五年计划。这个决策具有广泛的国际背景。

20世纪50年代是世界电视大发展的开端。1949年，还只有美、英、法、苏、荷、意6个国家办有电视，至1958年年底已有67个国家开办了电视。社会主义国家也兴起“电视热”。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纷纷于50年代开办了电视。中国在“东风”和“西风”的较量中自然不甘落后。

在开办电视的政治性动机中，与台湾的关系也是重要的砝码。

1957年，香港丽的公司开办了黑白有线电视，这并未引起北京的关注，但台湾当局放出口风，将引进美国设备，预定于1958年“双十节”开始电视广播，却引起了北京的警觉。于是，电视领域的奋斗便因其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而具有了特别的紧迫性。虽然实际上，台湾直到1962年“双十节”才借助日本力量开办了全岛第一座商业性的电视台——台湾电视公司，但北京电视台却急急忙忙于1958年9月2日宣告“正式播出”，上海电视台也抢在“双十节”前开始试播了。

2. 中国电视事业的诞生得到了“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很大帮助。

中国最初一批电视技术骨干是留学捷克的章之俭等人。他们仿照捷克式样设计了中国最早的电视发射机等核心设备。1957年12月至1958年3月，以后来的北京电视台正副台长罗东、孟启予等人组成的中国电视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和民主德国。回国后，他们基本上按照苏联、东欧模式塑造了中国

电视节目的面貌。天津712厂仿照苏联旗帜牌电视机试制了最早一批北京牌电视机。1958年，国家从苏联进口了一批红宝石牌和纪录牌电视机，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投放市场。1960年，上海开始批量生产主要以进口零件装配的上海牌电视机。就连结婚蛋糕状的俄式广播大厦也带有50年代友谊的浓重痕迹——北京电视台最初的地址就在大厦西翼四楼拐角处的一个排练厅以及周围几间屋子里。

50年代，社会主义各国在广播领域的合作是相当密切的。电视诞生后，合作关系自然而然地扩展了。中国分别与苏联和罗、匈、波、民德、捷、保签订了广播电视合作协定。

1958年5月8日，北京电视台首次播出外国节目——民主德国庆祝“五一”和北京电视台试播的祝贺词及电视新闻片。接着，北京电视台播出了《苏联新闻》等以专辑形式出现的分国新闻影片。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北京电视台设立每周辑、每辑数国的《国际新闻》专栏。

北京电视台从1959年开始对外寄送节目。绝大多数是新闻影片。自拍的出国片是只附外文解说稿的16毫米无声黑白片，当时电视台还不具备制作有声影片的能力。

每逢新年，电视台要自拍或请电影厂代拍一部电视贺年片；有重要外宾，要邀请客人到电视台讲话。

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和东欧国家电视节目渐渐隐退。中国陆续与阿联、古巴、朝鲜、阿尔巴尼亚、越南建立了合作关系，但入少出多。1963年中苏大论战爆发，电视屏幕上便不再出现苏联及其东欧盟国的正面形象。

3. 中国电视是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

北京电视台创办之初，覆盖面只及北京一地（半径25公里），但它仍被视为中央性的电视台，担负着全国性的宣传任务。

一批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包括中央领导人，是中国电视最早的固定观众。1964年

毛泽东为北京电视台题写了台名。周恩来、刘少齐、朱德都曾到北京电视台视察。周恩来对电视的关心甚至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从鲜花的摆放到乐队的安置，从拍摄的角度到新闻单位的分工都作过详尽的指示。

1958年5月15日，北京电视台第一次自办新闻节目，播放了4分钟的《图片报道·东风牌小轿车》。图片报道经常采用新华社的照片。1958年6月1日，北京电视台首次播放了本台记者孔令铎、李华拍摄的新闻片——《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1958年10月1日，首次转播天安门广场的国庆游行。1958年11月2日，北京电视台开始口播《简明新闻》，此后时断时续。1959年4月18日，首次转播会议实况——周恩来总理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1959年国庆节前，人民大会堂地下室安装了一套黑白电视中心设备。1960年元旦，设立了固定的《电视新闻》栏目，播放新闻片和纪录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新闻简报》和长短纪录片曾经是电视台经常的和大量的新闻节目来源。

由于新闻片和纪录片是早期北京电视台新闻节目采用最多并坚持始终的报道方式，有人称这一时期是“新闻纪录片时代”。条件更差的地方电视台大多只能口播新闻和用图片报道支撑新闻节目。一些电视台也自拍新闻，但往往须送北京洗印；北京电视台也向各地发放自拍电视片拷贝。不过，大量宣传性的电视片时效甚低，面貌雷同。

4. 对于观众来说，电视主要是娱乐工具。大多数电视观众是在集体场所买票观看的。他们主要奔“正片”而来，观看压轴的故事影片或戏剧演出。

电影和戏剧转播在电视节目占有极大的比重。因此，早期电视又被称为“缩型影剧院”。电影常常先于影院在电视上播放；剧院演出尽可转播。影剧节目费用低廉，只是数目有限。但在非正规的游击状态下，业

务性的矛盾尚不突出。电视长期可有可无。大多数中国人不知电视为何物，对幸运的大城市的多数居民来说，它也不过是一种奢侈享受。

1958年6月15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了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此后，各地陆续出现的电视台也相继播出了它们制作的电视剧。

新生的电视剧在迅速反映现实，在满腔热情地歌颂时代精神方面发挥了轻便灵活的特长，但创作思想狭窄，存在简单肤浅的毛病。早期电视剧基本是现场直播的，形式更接近舞台剧而不是电影。

中国电视注重思想教育。“宣传政治”、“传播知识”和“充实群众文化生活”是其宗旨。“寓教于乐”是普遍的要求。少年儿童节目是较有影响的对象性节目。电视科普园地出现了《科学常识》、《医学顾问》和《生活知识》等知识性、服务性兼备的专栏。这些节目大多是在演播室内现场直播的。1960年，北京电视台在广播大楼内建成了新的电视中心和600m²、150m²和50m²三个演播室，室内节目的条件大大改善。那一年，专栏节目相当丰富。然而，正当中国电视前景似乎日益美好之时，中国社会却面临着巨大困难。

5. 经济危机的魔影渐渐逼近，电视大跃进遭到挫折。

在“敢想、敢说、敢干”的1958年，人们对新生事物兴趣极大，热情极高。1958年4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提出了“广播工作大跃进”的口号。12月，全国电视台基建工作座谈会吹响了电视大跃进的号角。于是，电视便在一大批条件并不成熟的大中城市遍地开花了。

“自力更生第一台”是哈尔滨电视台。1960年5月至6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电视工作现场会，推广哈尔滨电视台土法上马的经验。在1960年3月召开的

第七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制订的广播事业三年规划中规定,1960年至1962年电视台要发展到50个。各地纷纷因陋就简,加快步伐。1960年,电视台、试验台和转播台已达29座。1963年达36座。

然而理想毕竟不等于现实。由于经济困难,进口电视机停止了,国产电视机也被列入了高级消费品,禁止社会集团购买。电视事业进入了低潮时期。

1960年底,北京电视台精简机构,压缩节目。1963年2月,全国电视台、试验台仅留8座,占原有36座的1/4弱。

电视大跃进象其它方面的大跃进一样,犯了急性病。它造成了耗资不小的浪费。虽然不计成败的奋斗精神是值得景仰的,但是不计成败的莽撞行为则是应当避免的。

在困难时期,北京电视台也曾一鸣惊人。1960年4月,在对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报道中,北京电视台在首都各家新闻媒介中名列前茅。

1961年到1962年,北京电视台举办过三次以“有益无害”为宗旨的“笑的晚会”,引起热烈反响,也引起很大争议。在“左”的偏激思潮中,“笑的晚会”遭到否定。

6. 1963年,考虑到国内电视机甚少,电视宣传极受限制,而国外则有广阔的天地,加之“反修斗争”的需要,中央广播事业局为北京电视台制订了“立足北京,面对世界”的宣传方针。

1963年4月,由北京电视台主持,在广州召开了首次全国电视台对外宣传会议。困难时期硕果仅存的8个电视台——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沈阳、哈尔滨、长春、西安——讨论了提高出国电视片的质量问题。1965年8月,第二次对外宣传会议召开,与会者增加了太原、武汉两家电视台。此时国民经济形势好转,原来基础较好的下马电视台陆续恢复或“转正”。至1964年,中国已与27个国家的电视机构建立了正式或非正式

的交流关系。

早在1960年,北京电视台便同日本共产党主办的电波新闻社签订了交换电视新闻片的合同。该社曾为北京电视台弄到了第一架黑白录象机。1963年,北京电视台与英联邦国际新闻影片社(即后来的Vis新闻社)建立了交流关系。

1960年9月,周恩来总理会见英籍记者费力克斯·格林,并首次发表电视谈话。其后,1965年,中国开始了援越抗美的电视宣传。

1965年,主管教育的副总理陆定一赞扬了半工半读的太原电视工读学校,指出:“我们的电视是教育工具。”早在1960年,北京和上海等地都办起了电视大学,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电视教育的进程。

1966年后,“左”的情绪越演越烈,中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动乱”。

二、十年动乱(1966—1976)

1. “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保证“安全播出”,电视新闻不再允许采用无声片加配解说词、音乐和音响现场合成的方法。由于制作条件改善,播出的已是配好声音的合成片了。后来,在北京电视台,彩色胶片取代了黑白片。

但是,在这一阶段,业务问题并不具有重要意义,政治才是冲击一切、压倒一压的中心。

作为党的喉舌,北京电视台以惯常的政治热情投入了为“文化大革命”大造舆论的宣传活动。电视文艺百花凋零。统治中国大地包括电视屏幕10年之久的文化专制主义时代开始了。

为了“集中精力参加文化大革命”,北京电视台于1967年1月6日停播。全国大多数电视台也都停播,只有上海标新立异,独创了揪斗“走资派”的“电视斗争大会”。

1967年2月4日,停播近一个月的北京电

视台恢复播出。由于Vis新闻社坚持发行台湾的影片，而电波新闻社对中国又“态度很坏”，北京电视台分别与之断绝关系。1967年3月，北京电视台与旅日华侨创办的中国通信社建立了合作关系。

与中国来往的尽是一些左派共产党人和激进的被压迫民族的领导人。而在那些对“好斗的”中国疑惧参半的中间国家，中国寄送的电视片长期躺在机场仓库，无人认领。

毛泽东是电视新闻片的主角，他经常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电视台仍然经常报道各项建设成就，并一概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样板戏统治着电视文艺领域。

1967年12月，党中央派出军管小组，收回了被造反派夺去近一年的广播电视大权。全国“革命委员会”陆续成立，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了。

2.1968年前后，过去被迫下马或受命停播的省级电视台在新成立的革委会指令下陆续恢复。1970年10月1日，新疆、青海、宁夏、甘肃、广西、福建等地开始正式或试验播放电视节目。至此，除西藏自治区和北京市以外，大陆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建立了电视台。同时，利用高山调频发射台，加设电视发射机和天线，迅速建成了一批电视转播台。至1971年，全国的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总计已达80座，电视由各省、区首府向外辐射。

国家公用通讯网络的微波中继干线也发展起来，成为长途传送电视节目的主要通道。1971年，广播事业局正式向邮电部租用微波干线，“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已达全国20个省、自治区首府和直辖市。

3.“无产阶级司令部”最关心的是彩色电视。对此，姚文元等“中央首长”有多次“指示”。广播局军管小组本着“打破帝修反封锁”的指导思想拟订了发展彩电的具体规划。

1970年，彩电会战大轰大嗡地展开了。

然而，攻关迟迟不克。在物质、技术、经验、信息都十分匮乏的情况下，闭门造车实难一蹴而就。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受挫了。

早在1959年，中央广播事业局便开始了彩色电视的研制工作。1960年5月，采用美国NTSC制式建立了一座彩电试验台。但因为国家经济困难，彩电试验被迫下马，一停就是10年。

10年之后，差距已非常之大。世界主要先进国家的彩色电视已进入稳定发展的繁荣时期。技术不断改善，造价日益低廉。全球已形成以美国NTSC、法国SECAM和联邦德国PAL三种制式三分天下的态势。中国不愿意列入任何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势力范围，决心自创制式，从零开始。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力更生”原则被歪曲应用，成了束缚人们手脚的一条政治戒律，没人敢言及开放、引进——除非“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指示。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他来得正是时候。他的到来，特别是跟随他的美国三大广播公司庞大采访队伍及其设备的到来，给彩电试验中动摇不定的天平加上了决定性的砝码。

1970年，在毛泽东“个人崇拜讨厌”的指示下，北京电视台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从9月1日起停止播放光芒四射的毛泽东头象。林彪事件之后，1971年11月22日，连每天节目开始前的毛泽东语录也消失了。1971年6月28日，在中断关系4年之后，北京电视台与Vis新闻社重新签订了互购电视片的协议。8月，开始不定期播出《国际新闻》。

尼克松访华不仅打开了中美交流的大门，也开阔了中国电视界的视野：在电视领域，中国比它的美国同行差许多，这差距不是一下子消除得了的。这个发现终于使中国放弃了劳而无功的“自创制式”，决心从国外引进彩电技术和设备。彩电会战无疾而终。

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向国务院提出了“进口彩电设备”的请求。中国选择了既不同于美国、又不同于苏联的“PAL”制式。

1973年5月1日，面向首都观众的彩色电视正式试播。8月1日，上海电视台试播彩色节目。天津电视台、成都电视台也先后开办了彩色电视。8月7日，北京电视台的彩色节目开始通过京津、京沪微波线路向外地传送，由每月一次逐渐增加。至1975年初，北京电视台向外地传送的节目已由彩色黑白交叉改为全部彩色。

1974年10月1日，北京电视台对外宣布彩电播出。1977年7月25日，北京电视台面向全国和面向首都的两套节目全部成为彩色。中国电视彩色化的过程开始了。

4. 中国的大门刚刚打开一条小缝，各式各样的摄影记者和电视制片人便争先恐后前来。西方对崛起的红色巨人充满好奇，但中国只优待“友好人士”，并为他们的“宣传”抱着相当功利主义的态度。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引起的风波固然由于两种纪录电影观念的龃龉，但更主要的是，大权在手的“四人帮”要借此“批林批孔批周公”。

1976年是中国政治转折的一年。周恩来的逝世唤起了人民，组织了人民。接着，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这些重大新闻一次次通过国际通讯卫星向世界播放。

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结束了。今后的社会舞台将为电视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前景。

三、恢复阶段（1976—1978）

“四人帮”被打倒了，神州大地又有了可以自由呼吸的空气。

一时间，诗坛出现了繁荣景象。《天安门诗抄》广泛流传，诗歌朗诵音乐会盛况空前。许多遭到残酷迫害的文艺工作者重新登台与观众见面，许多被禁锢多年的文艺作品成为“重放的鲜花”受到热烈欢迎。1976年

12月21日，北京电视台转播的《诗刊》朗诵音乐会开始了大规模地为革命历史歌曲和著名文艺工作者恢复名誉的活动。以《洪湖赤卫队》和《东方红》为标志，文艺领域解冻了。

“文化大革命”末期专为毛泽东录制的一批传统节目陆续与电视观众见面。外国影视片渐次出现。重新开始的中国电视剧改为录制播出，有了“小电影”的形态。

一批在“文革”初期停办的专栏节目又有了新的生机：如体育节目、卫生常识、儿童节目、文化生活……1977年10月和11月开办的《世界各地》和《外国文艺》象两扇窗口，展示了外部世界多姿多彩的生活。《祖国各地》使中国人民得以神游中华大地，开阔眼界，增长知识。

科学和教育的春天也来临了。1977年底，北京电视台开办电视教育讲座，1978年4月，上海恢复了电视大学。

1978年元旦，《全国电视台新闻联播》（简称《新闻联播》）正式设立。早在1976年底，北京电视台的彩色节目已传至全国除西藏、新疆、内蒙古三个自治区以及台湾省以外的26个省、自治区首府和直辖市。1978年7月，已有8个电视台可以向北京回传节目。一个全国性的电视播出网正在形成——尽管电视接收尚不普遍。

197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正式改称“中央电视台”。同天，西藏电视台试验播出。一年后，北京市开办了电视台。从此，“北京电视台”含义改变，全国省级电视台全部建立。省电视台中原以省会城市命名的，纷纷仿效中央电视台榜样加以正名。

1981年6年，因“文革”而停办的《广播节目报》改名《广播电视节目报》出版。1981年，《电视周报》应运而生。

有了遍布全国的电视广播网，确立了中央电视台这一国家电视中心，再加上一份定期的收视指南，中国电视事业比较正规化

下转62页

这一主线和角度并不分外新颖，但，民众对他的误解则构成了这一悲剧的新侧面。特别是那个结尾：他死于封建君王和对垒者之手，是人人都会感到必然的，不太惊愕的；如今，他竟遭到民众的莫大误解，施以凌辱，这实是使人震撼的意外了；而且，他的结局竟成了几百年来沉冤，那又比死百次、千次有更大的悲剧色彩。春秋史笔，直到在当代的电视屏幕上，才将这天大沉案彻底翻了过来，这恐是袁崇焕的在天之灵都难以想见的。可见，同在一个“悲”字上，《袁崇焕》的创作者是作了多么动人多采的表述。这也是要有独到眼光和功力的。

三部现实题材长剧《家教》、《绿荫》、《师魂》，其所表现的事件、背景都不复杂，都是比较单纯的，而由此生发开去的内涵却是丰富的。《家教》触及了“家长制”的残余意识；《绿荫》赞美了绿荫对一代代生命之爱，之庇护，而又点出了过厚过浓的绿荫是不利小草生长的；《师魂》则将似无实有、似隐实现的师魂精神形象地抒写了出来，等等。它们并无简单的说教感，而都升华为一种人生哲理，一种丰富的思想内涵，给人深深的启迪。有人总担心文艺作品有思想性，以为这将影响作品丰富的生活内容和审美效应，其实，在优秀的作品中它们是统一的。而且，若是一部8集、10集的长剧，竟全无丰富的思想内涵，那也是难以想象的，很难成为上乘之作的。

比较而言，《王昭君》的后面部分，《那

五》的最后两集，都陷入了单一的思想模式和情节模式，是色调还不够丰富的主要原因。可见，电视长剧十分需要注意单纯和丰富的一致，而不是相反。

电视连续剧，特别是长剧的创作历史还很短，成绩是显著的，是应充分肯定的。

在新时期的下一个十年里，电视长剧必将成为电视剧中最主要，最有影响力的品种。如何拍好电视长剧，是需要下功夫探讨和研究的题目之一。

关键则在质量。我们可以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制作少量集数更多、更长的剧目。但，盲目贪多求大，以为唯大唯长才能产生重大影响，才能一剧成而各扬天下，那是会造成人、财、物和时间上的多重浪费的。既然一部长剧费钱又费事，不更需要从质量，从观众角度有充分认真的考虑吗？

拍好长剧，涉又编、导、演、摄、录、美诸方面的合作和提高。那种突出存在于电视剧创作中的游击作风、草率态度、凑合方式，将会使一部长剧更暴露出种种缺陷。这是屡见不鲜的。这便需要从头至尾都有一种严格负责的精神和组织措施。

拍好长剧，是和世界电视剧竞争的重要措施之一。中国就有几亿电视观众，我们应该将他们争取、吸引到长剧的屏幕前来，以满足他们娱乐、审美思想上的需要。

电视长剧，是电视特有的、影响巨大的一种艺术形式；应该、也完全能够拍得好一些，更好一些。

（上接93页）

样了。

1978年底，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半年多的真理标准讨论作出了肯定的结论。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国的社会改革除去

了一个最大的障碍。

中国电视的大发展即将开始。

注：本文是根据作者21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电视史稿》，——节选缩写的。因引证颇繁，故一概略去。